

「德川思想中的儒家價值」學術研討會

日本「中期水戶學」的學問體系及其發展

徐興慶

東吳大學



日本「中期水戶學」的學問體系及其發展

徐興慶

【初稿，請勿徵引】

前言

「水戶學」自明曆3（1657）年，水戶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以下簡稱光圀）在彰考館（史局）編修《大日本史》開始，這部史書是以紀傳體編纂天皇治世之歷史書。整體而言，全書貫徹了彰考館以光圀及朱舜水弟子安積澹泊（1656-1738）為中心的「前期水戶學」歷史思想概念。光圀逝世之後，自第三代藩主德川綱條（肅公，1656-1718）至第八代藩主德川修齊（哀公，1797-1829），近140年之間的水戶學發展，學術界鮮為探討。所謂「後期水戶學」，係自寬政（1789-1800）、天保（1830-1844）時期以降，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設立「弘道館」（1841）之後，其教育及思想的發展，逐步與藩政改革及政治運動結合，以藤田幽谷（1774-1826，以下簡稱幽谷）和會澤正志齋（1781-1863）、藤田東湖（1806-1855）等人在內憂外患的危機意識之下產生以政治、海防、經濟發展為核心思想的尊王攘夷「國體論」，此對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水戶學」的學說涵蓋了朱舜水（1600-1682）的學問傳播，亦綜合神道與國學、「神儒一致」、「忠孝一體」、「效忠君子」等以道德為核心思想的詮釋，前後建立了一套以「大義名分論」為核心的尊皇思想體系。¹

¹ 《大日本史》全397卷，主要以彰考館成員參與編纂，對多領域的文獻進行比較、對比，確認史料來源，以儒教思想為基礎，嚴謹的正閏歷史人物的是非做為問題意識，為這套史書的特色。編纂時間自明曆3（1657）年至明治39（1906）年，主要分前期，編纂《紀傳》（1657-1737），後期（1786-1906），涵蓋《紀傳》的校正、翻刻（重印）及「志」「表」的編纂。

在前後期水戶學的學問及其思想的發展過程當中，立原翠軒（1744-1823，以下簡稱翠軒），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翠軒門下有小宮山楓軒（1764-1840）、藤田幽谷（1774-1826，以下簡稱幽谷）兩位高徒，幽谷自寬政 9（1797）年開始，因為《大日本史》的編纂方針不同及「彰考館」的主導權問題，師徒之間產生分歧的意見。「水戶學」的發展，分成翠軒與幽谷兩派，在思想上、情感上曾經對立。到了文政時期（1818-1831），兩派開始提出藩政的經濟改革，共同擁護藩主德川齊昭，「後期水戶學」的思想在日本社會發酵，才出現了轉緩的景象。²因此，本文希望對於「中期水戶學」的概念做出歷史演化及學問體系發展的考察，期能釐清並補足「水戶學」發展史的一段空白。

一、立原翠軒的學問形成

1. 出身及學思歷程

翠軒本姓平氏，常陸平氏大掾氏之門，又名甚五郎。諱萬，字伯時，號此君堂、東里，任官後改號翠軒。翠軒父親為水戶藩彰考館「管庫」立原蘭溪（甚藏，1713-1771），為德川中期至後期的水戶藩士。翠軒長男立原杏所（1786-1840）³亦是水戶藩士的南派畫家，其孫為幕末志士立原朴次郎、畫家立原春沙、至昭和初期的詩人、建築家立原道造亦為翠軒的後代。翠軒作為水戶藩學問的守護者與傳播者，曾在第五代藩主德川宗翰（1728-1766）、第六代藩主德川治保（1751-1805）時期任彰考館文「庫役」。翠軒年少時，師事谷田部東壑（1733-1789），⁴寶曆 10（1760）年，田中江南（田中清，1728-1780）將荻生徂徠（1666-1728）古文辭學派的學問引進水戶，翠軒與東壑一起入門受教

² 小室正紀〈水戶学立原における「民富論への模索」—小宮山楓軒と大内正敬を中心として—〉，《三田学会雑誌》83 卷，特別號 1。1990 年 9 月。

³ 立原杏所（1786-1840），翠軒的長男，名任，字子遠、遠卿，別號東軒、香案小史。德川後期的畫家，常陸水戶藩士，頗獲九代藩主德川齊昭的信任。隨林十江、小泉檀山、僧月遷等人學畫，受谷文晁的影響極深，與德川後期的漢學家、蘭學家、政治家、畫家渡邊華山交往密切。

⁴ 谷田部東壑，水戶藩士。名常德，字子玄，通稱藤八郎。彰考館《大日本史》編修館員，曾在京都與吉益東洞學古代醫學，著有《東壑筆記》。

，主要目的是想理解徂徠的治學方法。

田中江南，字子纓，號江南，稱田中三郎右衛門，為江戶出身的漢學家，亦是儒學家大內熊耳（1699-1776）的門人。他自 1770 年開始遊歷各地，促進神道的繁榮，同時為了學問的發展，成立文庫並往建設「學校」的方向發展。1666 年，朱舜水應光圀之聘時即提出創建「學校」的想法，但因編纂《大日本史》所費不貲，造成財政困難，「學校」的建設遲至 1841 年，藩校「弘道館」建立才完成。此外，田中江南認為「神道」的本質不是祈禱或修心，而是治理天下國家的人民，此與中國「聖人之道」的說法是一致的，亦即他將徂徠「道」是「安天下之道」的論述轉至「神道」思想的應用上。換言之，江南的「學校論」是以「神道」等於「聖人之道」為前提。他主張將衰退的「林崎文庫」⁵改建為中國周朝的學校模式，對古代「學校」有獨特的見解，認為周代「學校」不僅是一個教育機構，亦是「上下老少聚會與遊戲」的場所。亦即，他對「學校」的概念，不僅是「長幼有序」、「人倫之道」等道德行為的談論場所，也是透過社會交往學習各種學藝的場所。⁶光圀開啟水戶藩「敬神崇儒、無有偏黨」的核心思想，江南、翠軒延續「神儒兩道」並存的國民教育理念，有其脈絡可循。

在江戶，翠軒的文章學大內熊耳、⁷唐音學折衷學派的細井平洲（1728-1801）⁸、書

⁵ 「林崎文庫」是受到伊勢神宮外宮的「豐宮崎文庫」影響，成立於 1690 年，因為它依賴幕府的資金，且無周延的計劃，從一開始就經營困難。但知名的國學者本居宣長曾經不遺餘力地提供協助，甚至贈送了至今仍刻在石碑上的《林崎文倉詞》。此外，對國學研究感興趣的京都和服飾商人村井古巖也捐贈該文庫藏書 3,707 冊。目前「林崎文庫」遺址除伊勢神宮開放日之外，均不對外開放。

⁶ 高山大毅〈礼の遊芸化—田中江南の投壺復興〉，《近世日本の「礼学」と「修辞」—荻生徂徠以後の「接人」の制度構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6 年），頁 112-147。

⁷ 大內熊耳，名承裕，字子綽，號熊耳山人，通稱大內忠太夫。德川中期的徂徠學者、詩文家。出身陸奧國三春藩（今縣三春町），有「荻生徂徠門人七才子」之稱。早期在江戶與秋元子帥學，後入仕岡崎藩・唐津藩之水野家。但大內熊耳最希望到水戶藩仕官，朱舜水門人彰考館總裁安積澹泊曾經要他提出「對封建策」「對禮樂策（中文版）」，但皆未獲採納。最後透過立原翠軒・毛利扶搖，力促編纂《大日本史》的「志」部。詳請參閱永吉雅夫〈大內熊耳と水戶藩学〉，《文学》（東京：岩波書店，1989 年），頁 86-100。

⁸ 細井平洲，江戶時代中後期的儒學家，尾張（今名古屋）人，名德民，字世馨，俗稱

法學松平順賴（1727-1774）。⁹據《立原兩先生》提及：「翠軒自幼喜好讀書，初與谷田部常德句讀，谷田部察其非凡，期以大成。其他童子雖遺放忘多，但谷田部未加斥責，但翠軒若有遺忘，則嚴厲譴責監督，未幾，即展露頭角」。¹⁰又及：「翠軒稍長，其精力過人，曾與並木六郎次郎（田中江南）問學，當時接受並木委託謄寫，一天可以完成六十張，人皆驚嘆，無人能出其右，且記憶力非常。當時與吉田坦藏交善，兩人並列為同藩才子，傲視群才，無人能及。一日，翠軒訪吉田家，兩人高談闊論，旁若無人。翠軒仰臥之間，朗誦《莊子》〈秋水篇〉，一字無誤。吉田遺忘之節，翠軒隨即唱和，至夕陽西下，忘我之境，對其強記功夫，吉田深感佩服」。¹¹

據翠軒〈蘭室詩集跋〉提及：「予弱冠始入江戶，學吳音於平洲先生，時出羽人神保蘭室兄，亦來入嚶鳴館中，時時相見，知其人質實篤學，同好之誼可親己而東西分離，不相見者久之。或逢出羽人，必問蘭室先生起居，聞其學術大行，為一國斗望，予心竊自喜焉。然鴻道阻不能相通，常以為憾！予已老廢無行，致仕家居，而賤息被擢用，移居江戶，予亦從之。在江戶，出羽人松本文雍，數往來最親交。文雍，蘭室先生門人也。於是得審先生進狀，且因文雍詩書相通，千里筆肩，五十餘年遠別之嘆一旦尋舊盟，此喜如何？頃文雍來告，先生門下有詩集上木之舉，今予提其末，同好之誼不背，就其書付賤名，亦此生之幸也」。¹²

據此，可以窺知翠軒二十歲開始，與平洲學吳音的同時，就與神保蘭室（1743-1826）及其門人松本文雍「詩書相通，千里筆肩」，過往甚密。蘭室是德川中期出羽國米澤藩（今山形縣米澤市）的儒學者，早年在平洲門下讀書，三十歲被藩主上杉治憲（鷹山，1751-1822）任命為開設藩校的「御用掛」，他努力實現藩校「興讓館」的構想，邀請平

甚三郎，別號如來山人，為中西丹淵的門生。在江戶開設私塾「嚶鳴館」，之後受米澤藩主上杉鷹山邀請到藩校「興讓館」教書，亦致力於尾張藩（名古屋）校「明倫館」的復興。著作有《嚶鳴館詩集》、《嚶鳴館文集》、《嚶鳴館遺》、《詩經稿古傳》等。

⁹ 松平賴順是水戶藩第四代藩主德川宗堯的庶長子。幼名輕麻呂，賴順的書法由松下烏石傳授，後來傳給立原翠軒。

¹⁰ 前田香徑《立原翠軒》，（水戶：立原善重，1963年），頁20。

¹¹ 同上註，頁21。

¹² 立原翠軒《此君堂文集》102，德川博物館藏。

洲到米澤，將藩校「興讓館」做為教育武士的學校，自己也以督學的身分參與教育工作。文化13（1817）年，蘭室退休之後，晚年開設私塾，教育門生，「蘭室」為其隱居號，留有《宜齋堂集》（1822）。

翠軒博覽群書，尤嗜伊藤仁齋（1627-1705）、徂徠諸家之書，卻受到當時總裁名越南溪、富田長洲等人的排斥與教誨。¹³當時彰考館員多數為朱子學者，但徂徠學者田中江南在水戶講學，脫離傳統宋學的窠臼，受到翠軒等多數水戶年青學者之好評。翠軒的求學過程，重視詞賦文章，尋訪金石風流，雖有儒學傾向，但也向現實肯定主意傾斜，積極思考徂徠學的治學方法。主張學問的吸收必須廣博，表明「六經諸史皆吾師」的求知態度，認為學問不宜有流派，解經者，漢傳唐疏宋注，起於古書參與諸家之說，強調折衷學習的態度，傾心的方法論即是尊重儒教六經古典之徂徠學核心思想。翠軒雖說「我努力學習，是修身齊家」，「未曾誹謗程朱」。不過，當時水戶藩學者唯讀朱子學相關的書籍，只論道德性的學問，因此，翠軒的治學方法被視為誹謗程朱、廢棄道德，有背馳學統之慮的異端學問。

2. 《大日本史》編纂的再啟動

《大日本史》的編纂，至1701年光圀逝世之後，聘任的修史人員陸續衰老，史書的草稿幾乎原封不動，導致水戶藩的學問發展日益衰退，彰考館的編史事業，名不符實，直到第三代藩主德川綱條繼承編纂事業，歷經十餘年的校訂才完成，但並未能付諸刊行。當時對於史書名稱也有《皇朝新史》的提案，至正德5（1715）年，光圀逝世150周年，綱條才完成「大日本史敘」，¹⁴將這部史書命名為《大日本史》。其形式與司馬遷的《史記》同為紀傳體，但《大日本史》和《史記》在「名分問題」上的認知是有其差異。¹⁵

¹³ 吉田俊純《水戶學と明治維新》（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頁17。

¹⁴ 「大日本史敘」雖銘記「權中納言從三位源綱條謹序」，但實際撰稿者為大井貞廣，號松隣、南塘，曾學於伊藤仁齋的古義堂，晚年光圀聘他進入彰考館，寶永4（1707）年擔任彰考館總裁。

¹⁵ 詳請參閱陳韋哲〈水戶學名分論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有鳳初鳴年刊》第十三期，2017年5月，頁240。

1738年，朱舜水弟子安積覺逝世之後，編史工作一度停滯。翠軒積極探訪史學專書，傾聽資深史館人員的講課，志再編《大日本史》，期待將草稿校訂、刊行。雖經歷二十年編纂的歷鍊，起草「佛寺志」，仍難以獲得總裁的重用，主要是當時水戶藩的學問發展難以接受朱子學以外的多元學問所致。

翠軒在元文2(1737)年起草「佛事志」之後，向上司提出需要清稿，但遭到拒絕，而將草稿丟棄。當時編史的核心人物安積覺、名越直正相繼去世，寬延2(1749)年「大日本紀傳」清稿後即原封不動的被放置一旁，之後大約50年期間，總裁或編修者只聞其名，不見其行，無一人從事史書的修撰工作。抄寫生，一日抄寫半紙、一張，且退館者大有人在。遭逢此編史的怠惰時期，翠軒扛起承先啟後的編史大任。他誓言：「《大日本史》的刊行是義公(光圀)向來的志願，除了自己以外，別人無法完成，父親也有遺言，必須盡責，全力完成修史事業」。

翠軒對《大日本史》「紀傳」及「志」、「表」的編纂如何進行，於寬政元(1789)年有如下的建言：

從前史臣皆云，修志修志，沒年窮年，不能脫稿，徒以志之未成故，使紀傳之既成者併秘於府庫，義公經世之志，百年而未公於天下，甚可嘆也。夫義公之志，專在傳記，今宜精緻校訂，速佈諸人間，如修志則特其餘事耳。¹⁶

翠軒認為編修歷史書必須有「志」，廢除修「志」並非義公的意向。義公專注於「紀傳」的編修，修「志」雖有必要，但建議等「紀傳」完成之後再來著手。¹⁷菊池謙二郎的〈文公與翠軒〉一文中提及：「文公天資聰穎，獎勵文武技藝的學問發展，拔擢甚五郎翠軒，任命為「侍讀」，之後升為總裁，當時翠軒年僅二十二歲」。¹⁸翠軒的才華雖受到第六代藩主德川治保(文公，1751-1805)的賞識，但至寬政8(1796)年，五十三歲時才被拔擢為彰考館總裁。

¹⁶ 前田香徑《立原翠軒》，(水戶：立原善重，1963年)，頁32。

¹⁷ 同上註，頁25。

¹⁸ 菊池謙二郎〈文公と翠軒〉，《水戶學論叢》(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43年)，頁416-417。

對於為何需要持續修史，翠軒在〈擬大場大夫問彰考館諸生策〉（丙午，1786 五月）中，有如下的看法。

彰考館為何而定？為修史設也。誰設之，先君義公之意也。史全乎！紀傳已具，其志未成，其不成幾年？已歷肅、成、良三世。何其久，有司之意荒也！其如先公之大業何？今公纂修先德追尚遺美於義公之事，無不紹述焉！況修纂之事，經國之大業，天下之喜志，何可一日已。諸生道通學成，已充修史之撰，而曠日彌久，奉職無狀，豈忠臣竭命也哉！雖然事有杵闕，議有不同，和而不同，君子所尚，各言爾志，要終歸事成。予將博議大廷之上，勿有所忌避。¹⁹

翠軒做為總裁，為了繼承光圀的遺志，希望完成《大日本史》的編纂，他開始廣徵人才，以開放討論、集思廣益的態度，努力校訂史書，將修史一事視為「經國之大業，天下之喜志」，不可一日已。忠告門生「曠日彌久，奉職無狀，豈忠臣竭命也哉！」，而編史的態度可以「議有不同，和而不同，君子所尚，各言爾志」，但終歸要能事成。為了編纂《大日本史》，翠軒於寬政 7（1795）年 3 月 1 日（當年 52 歲），帶領門生到關西地區進行資料調查，有小宮山楓軒（32 歲）、藤田幽谷（22 歲）、飯村隄（33 歲）、外岡子慎、後藤太一、木村章等六名史局館員隨行。²⁰一行經由京都、大坂、奈良、高野、雄野、伊勢等地採訪古文書，歸途登上富士山之後回到江戶。²¹翠軒的弟子小泉壇山²²留有《富嶽寫真》²³一卷。翠軒的《此君堂詩集》留有「富士山」詩文一首。詩曰：

瑤台千載鬱崢嶸，海嶽鍾神第一名。半腹俯窺眾山小，絕巔回視白雲橫。

偏知今日仙靈助，幸遇一時煙雨晴。峻極冥冥天地外，悅然自覺舉身輕。²⁴

¹⁹ 立原翠軒〈擬大場大夫問彰考館諸生策〉，《此君堂文集》209，德川博物館藏。

²⁰ 中央公論社〈立原翠軒の關西調査行〉，《隨筆百花苑》（第三卷）付録，1980 年。

²¹ 中央公論社〈寬政七年西遊記〉，《隨筆百花苑》（第三卷），1980 年。

²² 小泉壇山（1766-1854），字子章，一名光定，號壇山，曾任黑羽鎮國社神官。儒學隨翠軒學，繪畫學於近江的島崎雲圃、京都的円山舉應。留有《壇山石譜》、《壇山斐齋小言》等著作。

²³ 《富嶽寫真》，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有彩木版一帖，全書十九圖，有安基良齋的序文、篠崎小竹的序書。《富嶽寫真》除了留有翠軒的詩文之外，也收錄皆川淇園、藤田幽谷、松崎謙堂等人的詩文。

²⁴ 秋山高志《水戸の文人—近世日本の学府》（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 年），頁 214。

這首詩是翠軒觀賞好友水戶藩士大場維景（玉泉，1750-1826）的「富士山圖」，有感而發的作品。

3.立原翠軒編「志」的立場

翠軒對於編「志」（領域史）的立場有別於「前期水戶學」以道德思想為核心的方向，而是著眼於多元學問的訴求。他在〈擬策問〉中提及：

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春秋》之作，言簡文約，後之作傳者，童習白紛，孰是孰非，終無定一焉。不知亂臣賊子所見如何？臣當時則能通，至後世則不能解古今異同，人有智愚乎！然當時之文，如繫辭論語共出於孔子，比之《春秋》，意盡語詳，文之異同，于未能弁之，希聞諸子之所安。今之為學，讀書尋義，得於心，修於身，不出戶庭而業成名顯。古之為學異於此。孔子問老子，七十子從孔子，未聞搜書問奇，耽讀沉思，而一以從書為務，不知古書少而今乏於書乎！學問之異同，明白置對。²⁵

翠軒廣泛收集文獻、資料，精讀《春秋》、《論語》、《孟子》，學仁齋、徂徠之學，認為治學之道必須能「讀書尋義，得於心，修於身」，且能解古今異同，作為考證歷史的依據。翠軒為了將安積覺時代的修史殘稿做全面的整理與校訂，他分門別類的派遣館員努力習得相關知識與技術。具體而言，服飾領域派竹熊通孝到京都山科家、雅樂領域派佐佐木重晁到京都山野井家、小池友識到京都日野家、小澤政敏到江戶山路家，進行編史不同專業的研習。翠軒自身亦對史實的內容逐一確認，這些編史工作的細節，可從他與德川中期的伊勢流「有職故實」研究家伊勢貞丈（1718-1784）、古學家藤貞幹（1732-1797）、屋代鴻賢、吉田篁墩、柴野栗山等人的往返書簡中得到答案。至享和3年（1803）為止，翠軒全心投入編史工作，終於寬政11（1799）年12月6日，光圀百年忌時，完成《大日本史》「紀傳」的校正，淨寫本八十卷上呈「義公（光圀）廟」，但此版本仍然未能出版。然而，翠軒放棄了「志」「表」的編輯，並提議在出版「本紀列傳」的同

²⁵ 立原翠軒〈擬策問〉，《此君堂文集》210，德川博物館藏。

時就結束《大日本史》「志」「表」的編輯工作。對此，弟子幽谷、高橋廣備等人表示反對，認為廢除「志」「表」有違義公光圀的遺志，而藩主治保也下令持續對「志」「表」進行編輯，導致翠軒萌生辭意，離開彰考館而隱居。²⁶換言之，針對之後《大日本史》的編纂方針，弟子幽谷與翠軒的意見相左，產生對立。菊池謙二郎提及：「翠軒、幽谷兩黨紛爭達八十餘年，終由藤田黨獲勝」，亦即有關「水戶藩朋黨之爭」的遠因，係因兩黨學派分裂，師徒之間對立的焦點有三：幽谷提議（1）將《大日本史》改為《史稿》；（2）持續「志」的編纂；（3）廢止《大日本史》的「論讚」部份。對此內容，作為師匠的翠軒均無法接受。為此，幽谷還寫了《丁巳封事》，上書批評藩政，師徒二人因此決裂。《立原兩先生》的作者無名居士在序文中亦提及：「水戶藩的紛爭八十年終歸由藤田黨（幽谷）獲得勝利」。這個說法至明治時期仍是一般日本學者公認的事實。此事已有諸多先行研究論述，本文不再贅述。²⁷但無名居士對於翠軒編輯《大日本史》的努力，以及推薦木村謙次、武石子新到蝦夷地（現北海道）視察，也都予以肯定。此與日本國防、海防安全警衛的歷史背景，必須做一貫的論述，才能顯示出翠軒在這個領域的貢獻。

栗田勤《水藩修史事略》（昭和3（1928）年刊行）第二卷中，寬政九年（1797）的條文有如下的記載：

寬政九年，當時的監理由大夫大場惟景擔任，總裁為立原萬。編修成員包含長久保玄珠、富田敏好、小宮山昌秀、小池友識、青山延彝、高橋廣備、川口長孺、櫻井安亨、小澤含章、藤田一正、杉山策、大竹親從、原廸等，總計四十二位館員。史館的成員都是才華橫溢的傑出人物。換言之，這個陣容符合中興時期的需求，這些館員如能在大場和立原兩位先生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共同致力於義公（光圀）修史的核心價值，應該能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完成志表的編纂，而不需要等待栗田寬博士²⁸的出現。

²⁶ 同秋山高志著書，頁438-439。

²⁷ 詳請參考梶山孝夫《藤田幽谷のものがたり2》（水戶：錦正社，2015年）。吉田俊純《寬政期水戸学の研究—翠軒から幽谷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年）序章。

²⁸ 栗田寬（1835-1899）幼名八十吉，初名利三郎，號栗里，海軍中將栗田健男之孫。幕末水戶藩的國學者及歷史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執筆《大日本史》未完成的「表」、

此外，翠軒做為多元學問的探究者與傳播者，從名分論到「日本尊嚴性」的自覺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曾經建議文公修復朱舜水模造的水戶大成殿，幕府在天明6（1786）年大火之後，仿水戶大成殿再造聖堂，之後日本昌平黌的再造亦仿大成殿模型而成。同時他也建議文公向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1773-1841）建言，勿循古例再接待「朝鮮通信使」，以減少幕府財政負擔，²⁹最後成為寬政年間（1789-1800）再啟《大日本史》編纂的關鍵人物。又，《翠軒先生遺事》提及：朱舜水原來模造的大成殿，年久失修破損之後，翠軒建議六代藩主德川治保修復完成，天明6（1786）年因江戶大火燒盡的幕府直轄機關湯島聖堂（昌平黌）得以大成殿的模型再造完成之經緯。翠軒及其弟子守護「朱舜水祠堂」，擬論述其建學方針以門戶開放主義為主，不採朱子學獨家學問，傾心徂徠學與新井白石學，朱舜水經世致用的實學理論影響了翠軒的建學方針。第七代藩主德川治紀繼續推動藩政改革，打破家老體制，重用儒學家。這個時期主要輔政者除了翠軒之外，有田中江南、川口長孺、藤田幽谷、青山延于等人，堪稱為建構水戶藩學問發展的重要時期，筆者稱之為「中期水戶學」，與前後期水戶學的發展啟了承先啟後作用而有其連貫性。《大日本史》編纂的重起，尊王攘夷「國體論」核心思想的發酵，也間接促發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大業，翠軒的功勞，學術界不宜忽視。

4. 基礎文獻的整理與學問的再興

光圀逝世之後，累積了諸多未整理的書簡，翠軒於明和3（1766）年，以編集員的身分進入水戶史館，對彰考館的工作積極任事，當時古器、古物破損日趨嚴重，書籍與

「志」工作。《大日本史》的「志」是將過去未能羅列的人物或故事，分門別類的做歷史論述，總計126卷。分1.神祇（卷234-266）計23。神社（卷239-264）計16。2.氏族（卷267-279）計13。3.官職（卷280-284）計5。4.國郡（卷285-317）計33。5.食貨（卷318-333）計16。6.禮樂（卷334-339）計16。7.兵（卷350-355）計6。8.刑法（卷356-357）計2。9.陰陽（卷358-363）計6。10.佛事（卷364-369）計6。

²⁹ 德川時代的「朝鮮通信使」自1607年至1811年為止，計有12次，由釜山經海陸寄港對馬島之後，進入瀨戶內海航行至大阪，再由陸路經京都到江戶（東京），每次花費的總額約100萬兩，而當時幕府年度的總預算約70-80萬兩，可見其支出之龐大，翠軒已經預見此將拖垮幕府財政。

記錄，卷次凌亂，目錄類遭蟲蛀情形亦相當嚴重，直到翠軒致力修護古器古物，逐一整理藏書、製作目錄（翠軒錄），修訂、補寫，進行文庫書架的釘製、修繕書箱、分類書物，並下令抄寫失闕的書籍及古器物的修繕等工作長達五十年之後，保存情況才逐漸好轉。這些文獻整理的工作紀錄在《江水往復書案》、³⁰《史館雜事記》等文獻中，詳盡的被保存下來。³¹翠軒使長期停滯的修史事業再度步入正軌。天明至文化、文政時代，是水戶藩發展本土文化的時期，翠軒察覺史局的藏書有不足之處，即將自己的「此君堂藏本」捐給彰考館，當時留有《獻納書目》刊載於《彰考館文庫目錄》（1919）當中，可惜彰考館因受二次大戰炮火攻擊，如今能辨識者已在少數。³²翠軒從廣博的角度涉獵詩文、書畫、音樂、古文書、系圖等學問知識，集合弟子開設私塾，其用人態度採取門戶開放主義，培養並錄用他藩優秀人才，對於水戶藩的文獻保存與學問發展有難以磨滅的貢獻。

5.立原翠軒的藏本與文獻保存、流傳

根據森潤三郎《多紀の事蹟》指出，當時具有文人趣味的同好，除了翠軒之外，還有多紀元簡、吉田篁墩、柴野栗山等人。舉例而言，前述與翠軒深交的大場維景，為七代藩主德川治紀、八代藩主齊修執政時期的水戶藩士，早年隨彰考館總裁富田敏貞學，廣讀群書，專攻砲術，並學天文，以收集古錢為趣，是一位文武雙全的碩學之士。³³大場維景常登富士山，喜愛素描、寫生，留有《富嶽遊記》及《富山真圖》，³⁴以收集翠軒

³⁰ 《江水往復書案》（萬延元年10月至11月8日），收入《水戶藩關係文書》第1（日本史籍協會叢書，1916年）。

³¹ 《大日本史編纂紀錄》是編纂期間抄寫的記錄，計248冊，完成於1867年，主要在水戶和江戶的歷史博物館（彰考館），據其內容分為：(a)《往復書案》193冊；(b)《往復書案》（抄本）（43冊）；(c)《雜事記類》（含目錄）（12冊）。涵蓋自延保時代（1673-1681）至元文時代（1736-1741）的日本歷史紀錄，是日本最大的史書，對當代及後世的學術和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本紀錄具體追溯了編撰過程，對於研究德川時代的學術、歷史、思想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現為重要文化財，京都大學圖書館藏。

³² 詳請參閱〈立原翠軒旧藏書について〉，《水戸の書物》，1994年。

³³ 立原翠軒〈玄賞齋記〉，《水府系纂》卷二，水戶彰考館藏。

³⁴ 《富嶽遊記》有抄本一冊，藏於東京「無窮會」文庫，《富山真圖》有十張彩色圖錄。這兩本圖錄，收入水戶藩主德川治保編的《尚古閣雜錄》之中，藏於水戶彰考館。草稿本由大場家保管，但因二次大戰而燒毀。

的詩文為主，兼收南畫家、篆刻家林十江（1778-1813）的文人畫、水戶藩的本草學者佐藤中陵（1762-1848）的博物學、高倉逸齋的鄉土史研究及座元大薩摩縫殿左衛門的「人形淨琉璃」。³⁵此外，茨城縣立歷史館藏的《大場氏藏書目錄》中，收錄了2,200餘冊的漢集、文學、地理、歷史、和算、天文、謠曲、茶道、古錢及印譜等文獻。與富士山有關的有：《寶泉寺新富士山圖》、《富士山禪定圖》、《富嶽集覽》、《富嶽遊記》、《芙蓉日記》《富士山名所記》等圖錄。

二、立原翠軒與古墳出土品

1. 文物保存與古碑的打造

光圀起頭編纂《大日本史》的過程中，致力於歷史資料的收集與保存，不遺餘力。翠軒對歷史文獻、古文物保存的熱情源於他崇拜光圀的編史精神。在保存古蹟方面，翠軒發掘了常陸二宮靜神社的古銅印及修護了中世資料寶庫的「六地藏寺文庫」。於寬政11（1799）年與弟子竹內茂喬、關澤政英、原儀兵衛等人，共同打拓並維護日本三大古碑之一的「那須國造碑」（現存於太田原市湯津上）。³⁶此碑為文武天皇（683-707）4（701）年，那須的豪族意斯麻呂等人所建。³⁷翠軒將此碑的拓本付上跋文，刊行於「咸章堂」。寬政7（1795）年，翠軒命弟子立川純美、木村謙次、高野世龍、園部幸八等人打造多賀城碑（今陸奧世川村），此碑亦為日本三大古碑之一。³⁸此外，翠軒修復了位於常陸鹿島郡的鹿島神宮³⁹自古以來持有大神社家族的文獻，並為其建造了一個儲藏箱，要求將其文物保存起來。又，文化2（1806）年，翠軒、杏所父子造訪在那珂郡門部村的農民勝山利衛門所挖掘的古墳及諸多文物，並確認文物具有保存價值，翠軒命杏所畫出一幅卷軸送給勝山家典藏。以上文物的保存、修補、複製、打造，大多是南北朝統一之後的作品。

³⁵ 秋山高志〈大場維景と「富嶽遊記」〉，同氏《水戸の文人—近世日本の学府》（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年），頁210。

³⁶ 原儀兵衛〈觀那須國造碑記〉。

³⁷ 真保昌弘《侍塚古墳と那須國造碑》。

³⁸ 〈徵北窺管〉，北海道大學北方資料室藏。

³⁹ 鹿島神宮，位於日本茨城縣鹿嶋市的神社。為式內社（名神大社）、常陸國一宮、舊社格為官幣大社（現神社本廳的別表神社）。日本全國約600座鹿島神社之總本宮。

2.立原翠軒的弟子及其著述

翠軒的弟子們編輯《大日本史》的過程中，受到翠軒的學風影響，他們亦進行水戶藩相關文獻的編纂與史料的保存。詳細敘述如下：

- (1) 小宮山楓軒（昌秀，1764-1840），常陸人，名昌秀。通稱次郎右衛門。德川後期的儒學者、民政家。早年師事翠軒，成為彰考館員，特別精通歷史與農政。著作有《水戶義公年譜》、《翠軒先生遺事》、《西州投化記》、⁴⁰《史林年表》（天明7年，1787）、《耆舊得聞》（文政元年，1818）、《文苑遺談》、《水府志料》、《水城金鑑》、《楓軒史料》、《楓軒文書纂》、《結城文書》、《盈筐錄》、《垂統紀事》、《農政座右》、⁴¹《垂統大記》等。

其中《水城金鑑》（49卷）集水戶藩各領域史料之集大成，第4-6卷為光圀的傳記、逸話及水戶藩內外圖書的採集。《垂統大記》則是翠軒辭任彰考館之後，藩主治紀命其與楓軒共同編纂，描述德川家康主從事蹟的歷史書，此書在翠軒歿後（1823），由楓軒於天保10（1840）年完成。《楓軒文書纂》為楓軒在文化、文政年間（1804-1830）收集抄寫各地所流傳約3,500件古文書的模本，以所藏者別分類的古文書集。《楓軒文書纂·結城》⁴²及《結城文書》⁴³收錄日本中世豪族結城氏之相關書簡、譜系圖等文書。

- (2) 川口長孺（1773-1835），字嬰卿，通稱三省、助九郎，號綠野。水戶藩的歷史家、醫學家。寬政5（1793）年，得翠軒推薦進入彰考館，曾經擔任水戶藩主德川治保侍講。文化12（1815）年就任彰考館總裁，著有《臺灣割據志》（1822，一卷）、《史館事記》

⁴⁰ 《西州投化記》（11卷）卷一述及：「秀（楓軒）嘗在彰考館也。與校史之事，旁涉獵群書，有漢唐諸藩投化之人者，隨筆抄書，積得若干冊，名曰《西州投化記》。（文化9（1812）年壬申夏五月，小宮山昌秀書於楓軒），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⁴¹ 水戶彰考館藏，史料編號：長7-53。

⁴² 《楓軒文書纂·結城》卷末有楓軒的識語（紅字），曰：右白川七郎家藏文書，以翠軒先生摸本寫之。文化12（1815）年乙亥五月廿五日，小宮山昌秀。彰考館文庫08558-08559。

⁴³ 《結城文書》亦有識語，曰：右岩城人鍋田舍人藏本。文政4（1821）年春寫，同年季夏以此君堂藏本寫，楓軒。文中「此君堂」是翠軒的別號。

(1828, 一冊)、⁴⁴《臺灣鄭氏紀事》(1828, 三卷)、⁴⁵《征韓偉略》(1831, 五卷)、⁴⁶《光太夫口語》、《台灣志》。

- (3) 青山延于(拙齋, 1776-1843), 青山延彝(瑤谿)之子, 通稱量介, 號雲龍, 師事翠軒, 寬政6(1794)年進彰考館, 享和2(1802)年晉升「編修」, 文政6(1823)年成為彰考館總裁。文化4(1807)年, 成為弘道館第一代教授, 提議擴大並發展學校的規模, 將舜水祠堂作為青少年每天早上的學習場所。後期的史館編修、水戶藩天保改革派的中心人物藤田東湖(1806-1855)在每個月的二日與七日於舜水祠堂講授《小學》、《論語》, 祠堂的授課直到文政10(1827)年朱舜水歿後的第145年為止, 持續發揮其教育的功能。此外, 青山延于曾奉藩主齊修之命, 編集水戶德川家史《東藩文獻志》。主要著作有《(正)(續)皇朝史略》、《文苑遺談》、《明徵錄》等。
- (4) 青山延光(1807-1871) 青山延于長男。字伯卿、通稱量太郎, 號佩弦齋、晚翠, 幕末儒學者、水戶藩士。曾校訂《大日本史》, 本紀・列傳出版之際, 代作藩主德川齊昭的跋文。擔任過彰考館雇、總裁代役、小姓頭、弘道館教授頭取, 最後成為大學中博士, 史學、文學造詣俱優, 留有《蕃舶記事》。

三、叢書編纂與書帖、書法

⁴⁴ 川口長孺撰《史館事記》(1828, 一冊), 全漢文謄寫, 記載彰考館的修史始末。詳請參閱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頁26-28。(錢明、田世民解說)。

⁴⁵ 川口長孺撰《台灣鄭氏紀事》上中下三卷編年體史書, 起自慶長17(明萬曆40, 1612)年, 鄭芝龍初謁日本幕府, 至元祿13(清康熙39, 1700)年, 清帝詔令鄭成功父子歸葬南安止, 凡記89年間鄭氏四世之事。與〈臺灣割據志〉較, 同者皆用, 並註明資料出處, 又皆附以考異式之自註。異者則《臺灣割據志》以中國紀元為主, 下附日本紀元, 《鄭氏紀事》改以日本紀元為主, 下附中國紀元。又, 《臺灣割據志》述及臺灣與先住民習俗及康熙末年朱一貴之變, 而本書皆未見。再, 〈割據志〉未詳載朱之瑜(舜水)事蹟, 而本書則增益之。本書原為刻本, 而〈割據志〉則未見刊行。

⁴⁶ 川口長孺撰《征韓偉略》, 漢文版編年體史書, 記載朝鮮壬辰衛國戰爭之史事經緯, 全方位考證豐臣秀吉發動戰爭各類原因。詳請參閱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頁166-172。(韓東育解說)。

1. 叢書編纂

翠軒根據彰考館及自己的藏書館，透過廣泛的人脈作為圖書資訊，尋求各種叢書的編輯，主要成果如下：

安永 8(1779)年，塙保己一(1746-1821)⁴⁷計畫出版古典的叢書，並於天明 8(1788)年開始刊行。寬政元(1789)年，水戶藩在翠軒的斡旋下，獲得塙保己一對編纂《大日本史》的協助。⁴⁸寬政 5(1793)年，塙保己一向幕府申請設立「和學(國學)講談所」及文庫，進行古典講習與出版，並獲得府內番町的土地和運營資金。講談所主要的工作為(1)講授國典，(2)文獻調查、校訂、出版研究、編輯和出版文學，(3)因應幕閣的諮詢。營運的核心人物除了塙保己一之外，奈佐勝梶、橫田茂詔、松岡辰方、屋代弘賢等當代的和學(國學)者都參與教育的工作。此外，「和學(國學)講談所」成立前後，幕府於寬政 3(1791)年將多紀氏的私塾「躋壽館」發展成為官立的醫學館，⁴⁹並將林家的私塾改成官立學校，發展一連貫的文教政策。

2. 法帖(書法拓印本)

⁴⁷ 塙保己一，德川時代的國學者，幼名は丙寅、寅之助，七歲時因病致眼睛失明，之後改名辰之助。他將日本全國各地的貴重書物匯集，分類成 25 部，出版《群書類從》(666 冊)，費時 41 年。之後又編輯《續群書類從》，此書至他去世 90 年，明治時代才完成出版工作。翠軒的叢書編輯工作，顯然受到他的感化及影響。

⁴⁸ 詳請參閱丸山季夫〈立原翠軒と塙保己一〉，《ぐんしょう》7-9，1963 年。

⁴⁹ 多紀元堅(1794-1823)，德川後期的漢醫學家。多紀家族第五代多紀元孝始創「躋壽館」(1765)，進行醫學講學。元孝之子元德時(1791)，幕府將「躋壽館」收為官辦並改稱「醫學館」，多紀氏世襲醫學館長職務。多紀氏一家主要主持幕府直轄的醫學館，從事校刊古籍的編纂及註釋工作而形成德川時代的考證學派。多紀元堅是多紀家族的第八代傳人，是多紀一門中的骨幹，著述豐厚，主要有《傷寒論述義》、《金匱要略述義》、《傷寒廣要》、《雜病廣要》、《素問紹識》、《藥性提要》、《藥治通義》、《腹診奇骸》等，後世日本人學習漢醫學者均以其書為重要的參文獻。舉例而言，高島久也、岡田元矩合撰《醫學目錄著作》(七卷)，刊於 1877 年。本書即將「躋壽館」中收載大量的中國古醫書，共 1390 部，分為二十餘類，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敷陳大義、介紹版本，是一部有關醫書的目錄學著作。現存日刻本。

水戶藩對法帖印刷的關注始於第五代藩主德川宗藩之子，書法家松平賴順（樂山，1727-1774）及松平賴救（1756-1830）二人。他們都以松下烏石（1699-1779）⁵⁰為師。明和年間（1764-1771），翠軒收集了各種著名的法帖，並對刻帖必要的墨水、紙張、刻刀以及拓法所需的技術進行了研究。當時位於水戶的「岩田咸章堂」聚集了知名的法帖及刻版名手，並以刊行各種法帖而聞名。其中《垂裕閣法帖》為日本著名刻帖，共 16 卷。第八代藩主德川齊修（1797-1829）命松平賴救帶領翠軒、藤田北郭、鶴殿清虛、立原杏所等人費力翻刻，於幕末的動亂時期完成的古法帖，內收東漢至明朝名家的法書，忠實反映了中國書道史的脈絡。例如，第二卷收集〈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翻刻自明萬曆 31（1603）年，董其昌（1555-1636）的《戲鴻堂法書》、第十三卷收集水戶德川家的珍藏品趙孟頫（子昂，1254-1332）《大學》（真跡）、第十七卷收集朱舜水、張斐、東臯心越等三人的書法。《垂裕閣法帖》堪稱名品，但此書出版數量有限，成為稀覯書，容後介紹。⁵¹此外，翠軒向來關心中國文人在水戶藩的事蹟，先後在咸章堂出版《舜水省菴墨帖》（一冊）、《那須溫泉八景》（一冊）。《那須溫泉八景》為接受光圀招聘的曹洞宗明僧東臯心越（1639-1696）的吟詩集。心越曾於元祿 6（1693）年遊歷栃木縣的那須溫泉，當時寫下的詩集即贈與溫泉神社，之後，神社詞官室井一馬請翠軒寫了序文，並交由咸章堂出版。咸章堂同時出版了《心越書畫帖》（一冊）。⁵²

3. 《垂裕閣法帖》與翠軒

翠軒最初師從松下烏石門下的松平樂山學習書法，樂山去世後，翠軒從 32 歲開始收集了二百多本法帖留存至今。《垂裕閣法帖》（全十七卷）初由第六代藩主德川治保策

⁵⁰ 松下烏石（1698—1779）名辰，字君岳、神力、龍仲，號烏石。德川幕臣松下常親的次男，德川中期的書法家，與佐佐木玄龍、文山兄弟學書法，其書風屬近於歐陽詢的唐樣書法。烏石亦工詩文，與服部南郭，晚年移居京都西本願寺。留有《消間印譜》等多數法帖刊行。

⁵¹ 計文淵〈彰考館所蔵の文献、書画と儒教文化〉、徐興慶/辻本雅史編《季刊 日本思想史》81（東京：ぺりかん社，2014年），頁40。

⁵² 秋山高志《水戸の文人—近世日本の学府》（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年），頁426-427。

劃，主要來自松平賴救（太玄齋）的名品集《靜觀亭刻帖》（十卷），文化 12（1815）年，賴救將十卷版呈給第八代藩主德川齊修（1797-1829），爾後彙整水戶德川家藏品，以齊修的書齋號「垂裕閣」為名，而集成《垂裕閣法帖》。此法帖收集了翠軒、杏所父子及翠軒門人藤田北郭、鶴殿清虛等人書法作品而成的古法帖，集水戶藩歷代書法同好的總人力於一身，完成於德川幕末時期。1986 年，住谷英明發表〈垂裕閣法帖-その成立と内容〉（《筑波書学》）一文之後，獲得學術界的回響。賴救與翠軒，同好書法，向來交好，尤其翠軒對於出版法帖情有獨鍾，其作法為：（1）透過臨摹書法家的原作以保存書法作品；（2）透過臨摹法帖來研究書法。因此，其法帖的修訂是非常嚴謹的。翠軒感於良質法帖的必要性，他與藥舖「伊勢屋咸章堂」岩田太郎衛門（健文）、重五郎（剛文）等人交流，請教版木的用材、用紙、用墨、刻刀等技術，並與岩田兄弟研究摺法。⁵³除了《垂裕閣法帖》之外，還刊行《淳化閣法帖》、《清暉閣法帖》、《寶元堂法帖》等百餘點的墨帖類。⁵⁴

翠軒於《此君堂定本十七帖》跋文中提及：

行世者筆之右軍他草書，筆法欠精，肥瘦失宜，蓋傳模之久，去真稍遠。今就淳化二王諸帖之善者，據舊本撰次雙鉤勒石，無者闕焉。取之左右，欲逢其源，是予汲古之意也。⁵⁵

及長，翠軒獲得西流派衛藤氏及東流派岩田氏的雙重評價而成為書法家。⁵⁶在此期間，

⁵³ 詳請參閱前田香徑〈立原翠軒と咸章堂〉，《水戶藩産業史研究会会報》2，1940 年。望月茂〈咸章堂岩田健文について〉，《水戶藩産業史研究会会報》6，1942 年。岡沢稻里〈立原翠軒と咸章堂の關係〉，《水戶藩産業史研究会会報》3，1940 年。

⁵⁴ 秋山高志《水戶の文人—近世日本の学府》（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 年），頁 402。

⁵⁵ 《此君堂定本十七帖》為翠軒集賀監本系統的《十七帖》刻本而成。跋文是立原萬（翠軒）於天明乙巳（1785）春，書於此君堂。詳見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Ⅲ—水戶藩内外關係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206-207。

⁵⁶ 翠軒與城下町商人咸章堂岩田太郎左衛門合作，販賣各種墨本，將之做成寺小屋式教育的教科書，讓當時水戶藩的子弟學習。岩田太郎左衛門，水戶藩城下町的商人，歷代稱為「伊勢屋」，以紙、藥品為業，後改稱「咸章堂」，專以出版墨本與販售為業。翠軒擔任史館總裁時代的店主為幸三郎健文，文化 10 年歿，年 53。

他與柴野栗山、屋代弘賢、賴春水、木村蒹葭堂、韓天壽等人皆進行知識的交換而聲名遠播。

4. 翠軒的著作與文獻

翠軒留有《西山遺事》、《此君堂文集》、⁵⁷《此君堂詩集》（二卷）、《此君堂詩集補遺》（一卷）、《徂徠先生真蹟》（一冊）、⁵⁸《往復書案》、⁵⁹《垂統大記》、⁶⁰《白石遺文》（二冊）及安積覺與德川幕府第六代德川家宣（1666-1712）、第七代家繼（1709-1716）將軍的重要墓臣新井白石（1657-1725）的往來書簡《新安手簡》（五冊）⁶¹等多數著作，並在《國書總目錄》中有五十八種文獻，⁶²這些文獻含著書、編書、抄書及評傳等，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藏的《見聞書目》中還能略窺一二。

特別一提《西山遺事》（上下二卷，天明六（1786）年丙午，立原甚五郎萬集錄），上卷 12 則、下卷 38 則）。記述《義公行實》、《玄桐筆記》、《西山遺事》、《義公遺事》等未記載的光圀逸話集錄，內附名越時正（1915-2005）的解說詳文。《西山遺事》自筆稿已經遺失，現以抄本流傳。⁶³又，日本同志社大學「小室澤邊紀念文庫」現藏有翠軒的

⁵⁷ 《此君堂文集》計文淵解說，請參閱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Ⅱ德川光圀文獻釋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206-207。

⁵⁸ 《徂徠先生真蹟》，收集「對問」一篇，原為徂徠贈與安積覺的文物，之後傳給徂徠弟子宇佐美瀧水。寬政 7（1795）年，翠軒向宇佐美瀧水弟子柴田元德詢問並找出「對問」一篇的下落，並將此書交由咸章堂出版，並回贈柴田元德數冊。

⁵⁹ 《往復書案》記錄《大日本史》編纂過程中，派遣到日本各地搜集史料的史館員與江戶史館員之間的往復書簡。這些書簡原稱「御用書」、「御用書案」、「御用狀」、「御用狀留」，至寬政年間開始，時任彰考館總裁的立原翠軒整理出來的史館記錄。

⁶⁰ 《垂統大記》（72 卷）是立原翠軒辭去彰考館總裁後，接受藩主治紀（武公）之命，與弟子小宮山楓軒（1764-1840）共同編纂的紀傳體史書。主要記載德川家康創業守成二代主從的相關事蹟。此書完成於翠軒歿後的天保 10（1839）年。《垂統大記》的書名是德川齊昭於天保 8（1837）年決定。「垂統」語出《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君子業創垂統，為可繼也」。這裡的「君子」是指東照宮德川家康，具有敬慕的意涵。

⁶¹ 《新安手簡》（五冊），收集新井白石致安積覺的書簡 30 餘封，主要針對安積覺提出史實、詩句、古籍等詢問的答覆書。

⁶² 秋山高志〈彰考館總裁立原翠軒の資料保存〉，同氏《水戸の文人—近世日本の学府》（東京：ぺりかん社，2009 年），頁 414-441。

⁶³ 水戸史学会編《水戸義公伝記逸話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78 年），頁 211-249。

自筆稿本、抄本、舊藏書七十餘部。此外，翠軒的弟子小宮山楓軒也曾整理「此君堂藏本」成為《閱書目錄》(十冊)，記錄自文化 5 (1809) 年至天保 10 (1838) 年，翠軒藏書供人借閱的詳實紀錄，現分別在國會圖書館留有「小宮山叢書」，在東京「靜嘉堂文庫」留有「小宮山楓軒叢書」，約六百餘冊，提供研究者查閱。⁶⁴由於翠軒將長期停滯的修史事業步入了正軌，對於水戶藩文獻的整理、保存及學問發展的連貫性做了承先啟後的梳理，致德川齊昭 (1800-1860) 以降的「後期水戶學」才得以開花結果。

結論

翠軒於寶曆 13 (1763) 年，20 歲進入史館工作，天明 6 (1786) 年，43 歲擔任彰考館總裁，在史館前後任職 43 年之久，在 18 年期間完成了《大日本史》的本紀(通史)、列傳(傳記)的文本校對、出版及「志」(領域史)「表」(年表)的撰稿與出版。同時以儒者的本分，擔任藩主的行政諮詢顧問，預知當時代日本國內外的國際情勢，向藩主德川治保提出「天下三大患」及強化海防的具體對策，⁶⁵此外，為了因應及理解未來日本的海外危急情勢，翠軒也讓館員渡邊大之助、倉橋藤四郎等人研習蘭學。當外國勢力逼近日本之際，翠軒也與蘭學家桂川甫周 (1751-1809)、漢醫學家多紀元簡 (1755-1810)、針灸家原南陽 (昌克，1753-1820)、考據學家吉田篁墩 (1745-1798)、等人親交。翠軒學問的形成，弘揚傳統的文化底蘊，兼修各家學說，取其精華作為學問的傳承方針，同時關注海外時勢，用以培養後學汲取國際知識的基礎教育，都延伸到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主政的「後期水戶學」之發展，對於喚醒幕末日本的對外危機意識，厥功至偉。翠軒參與藩政諮問、涉獵國政、振興學術，做為一位遍訪碩學鴻儒，精勤任事的史臣，其對「中期水戶學」發展的功績可以整理出以下幾點：

⁶⁴ 當時彰考館總裁有富田長洲、鈴木白泉、立原翠軒三人，翠軒為特命《大日本史》編輯。

⁶⁵ 翠軒參與六代藩主治保的藩政，提議向老中松平定信上書「天下三大患」，告誡幕府注意蝦夷地(今北海道)遭到入侵的問題。寬政 5 (1793) 年，翠軒派遣門人木村謙次到松前地區考察現況。詳請參閱拙書《跨國界的文化傳釋：朱舜水與近代中日人物的文明史觀論》(寧波：寧波出版社，2022 年)，頁 257-258。

1. 對《大日本史》本紀（通史）、列傳（傳記）的本文確認與出版

翠軒就任總裁之後，銳意編修《大日本史》，於寬政 11（1799）年，義公光圀百年忌，在廟前呈上本紀列傳的淨書本八十冊，並準備出版的工作。

2. 撰寫《大日本史》志（分野史）、表（年表）新稿與出版

翠軒對於安積澹泊留下「志」「表」的殘稿作全面校對，長期派遣館員到全國各地調查史料，修習知識與技術。

3. 在傳存貴重的歷史資料方面，調查史料並作紀錄，修補原本文獻、臨摹資料、

臨書、翻刻並製作副本保存。這些成績在翠軒《此君堂文集》及楓軒《翠軒先生遺事》中，歷歷可見。翠軒對原始史料的輯錄，古器、古物、古文書・古記錄的保存、記錄的補修行徑與態度，弟子幽谷稱之為「癖（習慣）」，一方面從概念上看待歷史的效用，另一方面則從現實的角度看待歷史。⁶⁶

4. 翠軒以自己的著作、編作影響弟子們關注編史、國事及農政，對當時代的產業及經濟的發展亦作出了貢獻。⁶⁷

此外，從《翠軒先生雜錄》⁶⁸中，也可以見到翠軒抄寫荷蘭文、俄文、滿州及鞑靼文字，從文字到文章，都能感受到他積極吸收異文化與活化知識的態度。翠軒除了博覽群書之外，還擅長書畫鑒賞、篆刻技藝，並傳授曹洞宗壽昌派東臯心越（1639-1695）禪師⁶⁹的琴藝，可謂多才多藝，在歷代水戶學者當中誠屬罕見。而其文藝方面的交友廣泛，在歷代總裁中，亦無人能及。

「寬政三博士」之一的柴野栗山（1736-1807）⁷⁰在給水戶歷史地理、徂徠學者「長

⁶⁶ 同秋山高志著，頁 440。

⁶⁷ 詳請參閱小室正紀〈水戸学立原における「民富論への模索」—小宮山楓軒と大内正敬を中心として—〉，《三田学会雜誌》83 卷，特別號 1。1990 年 9 月。

⁶⁸ 《翠軒先生雜錄》（3 冊），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

⁶⁹ 詳請參閱李美燕〈東臯心越之琴道及其自創琴歌之研究〉，《藝術評論》第 21 期，（臺北藝術大學，2011 年），頁 39-65。拙稿〈心越禪師と徳川光圀の思想変遷試論〉，日本二松學舎大学《日本漢文学研究》3，頁 313-356。

⁷⁰ 柴野栗山（1736-1807）初在京都研修國學，後接受幕府招聘，往江戶擔任昌平阪學堂教官。其博學多才，精通漢詩文，曾建議幕府實行異學之禁。詳請參閱阿河準三〈立原翠軒と柴野栗山〉，《水戸史學》13，1983 年。秋山高志〈立原翠軒宛柴野栗山書簡

久保赤水⁷¹へ送った序」(安永3(1774)年)中，提及翠軒如下的記事：

常陸國東海之上、土厚水深、人誠愍而氣專化、以義公肅、公之德、輔以朱舜水及栗山、鶴飼、安積諸賢、故其文物風俗、於當時為侯圖之首稱、其流風遺澤存今者、吾得之立原伯時長子玉數人焉。伯時余得之我久保仲通、仲通性識精嚴、少所許與、而於伯時稱之不舍、吾則未識伯面、然於其為人與學固信不疑也(中略)二子之學皆有瀟源、純美精確、議論鑿鑿有據、與世所謂豪傑之士師心妄作者萬萬不同也云云。⁷²

當時柴野栗山並不認識翠軒(伯時)，但已慕名翠軒是一位「為人與學固信不疑」的學問傳承者，二人最後成為莫逆之交，在「中期水戶學」的發展史中，也引出一段佳話。

2023.10.04 二校脫稿

一、二)，《目白大學人文學部紀要》(語言文化篇)7，2001年。前田捷三〈立原翠軒と寛政の三博士〉，《耕人》9，2003年。

⁷¹ 長久保赤水(1717-1801)本名玄珠，俗名源五兵衛，德川中期歷史地理學者、徂徠學者。彰考館員，曾任松平賴救的講讀，協助完成《性命圖論》、《參考格物致知》、《清客芝詩卷》、《百忍圖》等作品。賴救於寛政11(1799)年，為赤水立碑，名為「水戶前講讀官赤水長久保翁碑」。此外，完成《改正日本輿地路程全圖》(通稱「赤水圖」)而聲名遠播。「長久保赤水關係資料」(693件)，作為現今茨城縣最高價值的學術資料，於2017年被指定為有形文化財。2020年又有107件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⁷² 前田香徑《立原翠軒》，(水戶：立原善重，1963年)，頁71。